

刘大杰

撰

魏晋思想论

蓬

莱

林东海 导读

书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刘大杰

撰

90008267

魏晋思想论

蓬

林东海 导读

莱



阁

丛



90008267

书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蓬莱阁丛书

魏晋思想论

刘大杰 撰

林东海 导读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7.375 插页 5 字数 155,000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8,001—14,000

ISBN 7-5325-2490-6

I·1264 定价:11.00 元

出版说明

中国传统学术,经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,从清末民初起,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。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,融通中西,不仅肇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,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,而后者也正是当今学术界,经历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“世纪回眸”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。本丛书辑取其中尤具开创性而篇幅不大者,并约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导读,不仅梳理其理论框架,剔抉其精义要眇,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、历史文化背景,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境与心态,从而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,凸现大师们的学术个性。相信这一设计,会比单出原著,或笼统抽绎当时学风特点,来得更切近可靠。原著是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,导读为鞭辟入里的精赅之论,珠联璧合,相得益彰。这也许是本丛书有别于坊间同类丛书不可替代的特点而弥足珍藏。汉人将庋藏要籍的馆阁比作道家蓬莱山,有“汉家石渠阁,老氏蓬莱山”之称,后世遂称藏书阁为“蓬莱阁”,因借取而为本丛书名。

《魏晋思想论》导读

林 东 海

一、文穷而后工

“非诗能穷人，穷者诗益工。此语信不妄，吾闻诸醉翁”。这是苏东坡赠惠勤的诗句，表示赞同醉翁欧阳修“非诗之能穷人，殆穷者而后工”（《梅圣俞诗集序》）的说法，因而他自己也有“诗人例穷蹇，秀句出寒饿”（《病中大雪》诗）的看法。其实，从汉司马迁至唐韩退之，都持有这种观点，即刘禹锡所谓“穷愁著书，古儒者之大同”（《刘氏集略说》）。

先师大杰先生就是“穷愁著书”的“儒者”。他的前半生可以说经历了漫长的颠蹶困顿的旅程，然而却走上了一生光辉的顶点。刘先生 1904 年出生于湖南岳阳的一个乡村里，幼年失怙，寄养外家，自小即参与牧牛耕田，后以其聪颖，塾师破格录为门生。母亲谢世，舅母欺孤，于是逃进岳阳贫民工厂，工余上免费补习夜校，因而奠定算术、国文基础。15 岁考入武昌旅鄂中学，18 岁考入武昌师范大学。1926 年赴日留学，在

早稻田大学研究科攻读欧洲文学。1930年学成归国,先后执教于复旦大学、安徽大学、大夏大学、济南大学、四川大学。在求学的过程中,由于贫穷不堪,亦工亦读,历尽磨难,而其志益坚,其学益进;执教后,校方经常拖欠薪金,生活仍很拮据,却能结交同道,转益多师,努力著述,所以在创作、译作、著作诸方面,都很有收获。创作有《三儿苦学记》、《长湖堤畔》、《渺茫的西南风》、《黄鹤楼头》、《支那女儿》、《昨日之花》、《她病了》、《十年后》、《盲诗人》、《秋》、《一个不幸的女子》等;译作有托尔斯泰《高加索的囚人》、《迷途》,杰克·伦敦《野性的呼唤》,显克维支《苦恋》,陀斯妥也夫斯基《白痴》,屠格涅夫《两朋友》、《一个无可救药的人》,雪莱《雪莱诗选》,厨川白村《走向十字街头》,武者小路实笃《恋爱的病患者》,以及《日本短篇小说集》等;论著有《托尔斯泰研究》、《易卜生研究》、《表现主义文学》、《德国文学大纲》、《德国文学简史》、《东西文学评论》、《寒鸦集》等专著以及《英国花鸟作家赫德生》、《英国散文的风刺性》、《日本文学的近况》、《论新诗》、《红楼梦的地点问题》、《再说红楼梦的地点问题》、《红楼梦里重要问题的讨论及其艺术上的批评》、《红楼梦里性欲的描写》等评述中外文学的论文多篇。耕耘的辛勤,必有丰收的喜悦。先生在艰苦环境中的刻苦学习和努力撰述,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,二十余年,便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成果,无乃古人所谓“穷者而后工”乎!

以其穷而后工,固当益穷而益工。今以先师生平验之,乃知斯言之不谬。1935年7月,先生应聘到成都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;1937年夏,请假返沪探望家属,不意遭遇国难而困蹇申浦。“七·七”芦沟桥事变之后,同年8月9日,两名日本官兵猛驱军车直冲上海虹桥机场,为我守军当场击毙。日本

军国主义者以此为藉口,于8月13日在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。中国军民忍无可忍,奋起抗战。这就是有名的“八·一三”事变。抗战爆发后,交通阻塞,先生自然无法回四川大学,只好蛰居沪上。国家危亡之际,也是先生家境困绝之时。一家五口,拥挤在巨鹿路的一间客堂里,容膝而已。八年之中,其生活来源主要靠师母李辉群在中学任教所得的微薄薪水,其窘态可想而知。先生虽处穷极之境,然未尝一改其志节。有一私立大学校长以重金聘请先生去教授日语,先生坚守民族气节,愤然撕碎聘书与支票,并将碎片置于信封之中退还,从此与该校长绝交。人穷志不穷,此期间,先生赋闲家居,却能发愤著书,写出力作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。这部中国文学史,融进先生多年研习外国文学的心得,汲取了世界最新的学术思潮,同时借鉴了林传甲、黄人、曾毅、谢无量、胡怀琛、钱基博、刘麟生、刘经庵等中国文学史研究家的成果,集其大成,是一部观点新颖,材料扎实,条理清晰,文笔流丽的优秀学术论著。它自问世以来,几乎独领风骚,最为文学界所关注。历时半个世纪,虽然迭经风波,备受抑扬,却仍然屹立于文林众峰之上,展出独特的景象。五十年代以后,先生虽未尝辍笔,亦时有新的创获,然其成就终难以胜出。可以说,这部文学史是先生一生学术的最高成就,是其学术的最高峰。此即所谓益穷而益工者也。

蛰居沪上,写出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之前,先生已完成《魏晋思想论》一书。这部书虽是研究魏晋思想,却是先生文学研究的转折点,也是先生登上学术高峰的重要阶梯。先生的文学道路,始则涉足创作,继而从事翻译,其转向研究,则以介绍与评论外国文学发端,进而探讨本国古代文学。对于我国古

代文学的研究,早期只是对文学巨著《红楼梦》的若干问题加以考论,未曾系统研究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。洎其从日本学成归来,执教于高校,始系统讲授我国古代文学,于是有研究文学发展史的动机。倘若以外国文学思潮印证中国古代文学现象,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性,必导致枘凿扞格,因而探寻本国的思想源流,便是研究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必要前提。而中国思想的演变,尤其是文学观念的确立,魏晋时期正是重要关键。先生抓住魏晋思想加以研究,其用心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二、相似的历史

魏晋思想是本世纪初期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,写出不少论文和专著,这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。历史的发展不是笔直的,而是呈螺旋式上升的态势,所以有时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。大凡物极必反,合久必分,分久必合,一元变而为多元,多元变而为一元,务实转而崇虚,崇虚转而务实,强调客体化为提倡主体,提倡主体化为强调客体,突出群体意识转变为推重个体意识,推重个体意识转变为突出群体意识,历史就是这样在转化中辩证地发展的。贺昌群《魏晋清谈思想初论》一书有云:“文化思想之盛衰,盖有随时救弊之义焉。周末百家争鸣,至汉而整齐之,以名物训诂之实救其虚,实之弊必流于烦琐,魏晋六朝玄学以虚救之,虚之弊空疏,隋唐义疏乃以实救之,宋明理学复以虚救隋唐之实,清代朴学又以实救宋明之虚。盖利病相乘,因果相兼,而物极必反也。至此所举之虚实,但就其大体言之。”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,贺氏所论,不无道理。倘循此以推之,则知民元复以虚救清代之实也。清

廷衰败,帝制推翻,自辛亥革命之后,民元之世,名曰五族共和,实乃军阀割据,一元社会变而为多元社会,文化思想复由实转虚,学者多转向人生意义的探讨,一方面从西方引进各种主义,同时从古代汲取若干思想,因而学界主流便成了提倡主体推重个体的学术思潮。魏晋时期的思潮,正是由务实转向崇虚,由客体转向主体,由群体转向个体,与民元之初的思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,也有一些可资借鉴的有益之论,所以成为当时学术界研究的热点。

大杰先生是较早关注这一热点,并撰写专著的。他在该书的《前言》中,对写作动机作了明确的阐述。他认为魏晋时期政治是黑暗的,然而其思想却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:“魏晋人无不充满着热烈的个人的浪漫主义的精神。他们在那种动荡不安的社会政治环境里,从过去那种伦理道德和传统思想里解放出来,无论对于宇宙政治人生或是艺术,都持有大胆的独立的见解。”正统儒家衰落,佛道流行,形成清谈风尚,思想界一改昔日因袭传统,呈现万花撩乱的活跃景象,对隋唐佛学、宋明理学,都有深远的影响,“至于文学思想的发展,魏晋时代是带着革命意义的;必得经过这个时代,才可走到南朝的唯美主义的上去。因为当日浪漫主义批评家的努力,从儒家的手下,把文学争夺过来,给予以独立发展的生命”。居于这种认识,他说:“因此,我对于这时代发生了研究的兴趣,平日看书的时候,将这方面的材料,收集起来,渐渐地积着了不少了,经过数月的写作,便成了这本小书。”根据先生关于写作动机和写作经过的自述,可以看出,他深谙历史的相似之处,抓住了魏晋思想,也就是抓住了时代的脉搏。因为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孤立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,任何学术都打下深刻

的时代烙印,对于古代思想的研究,都是借古以鉴今,对于魏晋主体思想、个体思想的研究和肯定,正是为了宣传当代的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,亦即所谓民主自由思想。

先生的兴趣点,当然主要不在思想,而在文学,因为他毕竟不是政治家,也不是思想家,而是文学家。他在文学的道路上,从创作走向翻译,从翻译走向研究,从研究外国文学转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,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,自不能不首先关注魏晋文学观念质的变化,即先生所说的“带着革命的意义”。“文学”一词古已有之,然而其义向来十分含混暗昧。《论语·先进》记孔门四科: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,说“文学子游、子夏”,指的是子游、子夏擅长于文章博学;其后“文学”或指文献,或指官职,并非指现代之所谓“文学”。据鲁迅《门外文谈·不识字的作家》说,新派的所谓“文学”,“这不是从‘文学子游子夏’上割下来的,是从日本输入,他们的对于英文 Literature 的译名”。这个出口转内销的“文学”概念,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。中国文学观念的演变,经历两次含有质的飞跃的重大变革,第一次革命即在魏晋时期,第二次革命则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。第二次革命,使文学成为狭义的“纯文学”,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;第一次革命,使作为儒学附庸的文学游离出来,虽然仍显得驳杂,却取得了相对独立的身份,成了广义的“杂文学”。围绕这两次革命,不仅文学创作方面,特别是文学形式和技巧,有着长足的进步,在文学理论方面,无论是创作论还是鉴赏论,都带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建设。第一次革命把诗歌散文推向高峰,第二次革命则把戏剧小说推向未来。这两次文学革命,其时代特点与变革内容,都有些相似之处。研究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发展史,抓住这两次革命,便可以迎刃

而解了。先生是第二次文学革命的实践者,又是第一次文学革命的研究者,所以于文学的感受特别敏锐,对文学的认识也特别深刻。这不仅体现在他这本《魏晋思想论》之中,更重要的是反映在此后所著的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之中。

三、进化之史观

按一般的说法,影响国际文化的是希伯莱民族的基督教思潮和希腊民族的异教思潮。希伯莱思想是宗教的、禁欲的、以神为中心的;希腊思想则是科学的、满足的、以人为中心的。两种思潮的矛盾与斗争,构成世界文化史。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现代社会中,希腊思潮居于主导地位。自文艺复兴以后,人文思想使人性复归,克服了中世纪对地狱的恐惧和对天堂的希冀,表现出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。在人性复归的总趋势下,文艺领域产生了许多“主义”,诸如浪漫主义、自然主义、象征主义、表现主义、未来主义、实感主义,还有所谓达达派、构成派、立体派等等,都活跃于世界文坛。中国自“五四”运动以后,西方这些主义或直接或间接地传播进来。所谓间接传播,主要是指从日本这个“中间之驿骑”(王国维语)传递进来的。大杰先生之接受西方思想,正是在留日期间通过阅读日本译作这一途径得来的。

现代科学的发展,引起学术思想的新变化。达尔文《物种起源》提出生物进化学说,黑格尔提出哲学辩证发展观,丹纳(Taine)受其影响,创立环境决定论的文艺观。施宾加(J·E·Spingarn)在他的《新的文学批评》一文中指出:“泰尼(Taine)受了自然科学的影响,得了黑格尔的暗示,发生一种观念,以为

文学是民族、时代和环境的表现。”(引自刘大杰《表现主义文学》，北新书局1928年版)丹纳(泰尼)也被视为表现主义者，只是属于“外界”的表现，而非“内部”的表现。在各种主义各种流派，犹如潮水般涌进闸门，产生广泛影响之际，先生所接受的正是丹纳的这种进化论观点，并在这种观点指导下研究魏晋的思想和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。在《关于〈中国文学发展史〉的批评》一文中，先生承认：“我自己完全明了，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的思想基础，受有资产阶级进化论和社会学的影响。”(《文学评论》1959年第二期)这里所说的社会学，主要也是指进化论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，孔德提出“社会学”一词(Sociology)，这门人类行为科学便同其他学科结合在一起。二十世纪初，早期的社会学思想主要有社会达尔文主义，代表人物主要有斯宾塞、基德、摩根、丹纳等。他们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引进社会学领域，其基本观点就是环境决定论。丹纳《艺术哲学》第二章“艺术品的产生”说：“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风俗。”所谓种族、时代和环境三要素，从广义说，都是社会环境。进化观和社会学是部分交叉重叠的学术观点。这种观点不仅直接影响其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，也直接影响同一时期撰写的这部《魏晋思想论》。

以丹纳民族、时代和环境三要素来研究魏晋思想，倘若生搬硬套，在三个支点上建起七层浮屠，恐怕会因为失衡而坍塌。比如民族这一要素，便不能拿来大做文章。正如先生在书中说的：“从建安到永嘉，这一百多年中，是中国政治动摇最厉害的时代，也可以说是汉民族单独发展的最后期。从此以后，东晋偏安江左，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心的大江北部，为外族所据，中原文物，摧残殆尽。”(本书第二章)单一的汉民族文

化思想,在探讨其发展过程时,民族的要素渗透淹没在全过程中,反而无须单独揭出。需要特别用力的,便是时代与环境,即时空对于魏晋思想的作用。先生说,支配当代人心的思想与学说,“无一不有其因果,无一不有其背景的。不用说,在检讨魏晋思想之前,先明了这些社会的环境,实是必要的了”(本书第一章)。这里显然在交代用丹纳的观点来研究魏晋思想。从全书的布局,也可以看出受这种观点的影响:第一章“魏晋思想的环境”,第二章“魏晋学术思想界的新倾向”,第三章“魏晋时代的宇宙学说”,第四章“魏晋时代的政治思想”,第五章“魏晋时代的人生观”,第六章“魏晋时代的文艺思潮”,第七章“魏晋时代的清谈”。各章之标题,已隐约透露出进化之史观;行文中也经常提到进化论,如“因为这种移变,万物就生出各种不同的形体。这些形体都是一代一代进化出来的,这可以说是一种生物进化论”(本书第三章);“平心而论,无论是逍遥养生,或是纵欲,这种人生观的理论,都是不健全的。他们最大的毛病,便是违反了人类进化的法则,缺少救世精神”(本书第五章)。然而进化论之于本书,不只是一块牌子,用以表明观点,更主要的是一把刀子,是用以解剖魏晋思想的尖刀。

全书七章,分别以进化论从各方面去论证魏晋思想,研究这些思想在魏晋时代社会环境下的传承、发展和革新,特别注意到魏晋思想在进化过程中的重演性、选择性和变异性,从而使进化观成为本书的基本理论倾向。

首先,本书注意到魏晋思想传承中的重演性。十九世纪进化论者海克尔《生物体普通形态学》一文中,提出生物进化的重演律,认为胚胎发育,重复进化史中祖先成体所经历的阶段。这种重演,即社会学中所说的历史的相似。魏晋思想是

两汉思想的反动,又是战国诸子的重演,即突破了一元而回归于多元,因而思想重又出现争鸣繁荣的局面。正如本书《前言》所说:“魏晋人无不充满着热烈的个人的浪漫主义的精神。……中国文人生命的危险和心灵的苦闷,无过于魏晋,然而他们却能在多方面找着安慰,或是酒色,或是药石,或是音乐,或是山水,或是宗教,这些都是他们灵魂的寄托所。因此,过去的两汉称为思想界的正统的儒家,不得不被迫着而趋于衰落,老庄学说的流行,佛经的翻译,道教的发展,清谈的兴盛,都在这时代呈着活跃的状态”。这里说明魏晋一反两汉独尊儒术的倾向,而展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,犹如战国之于春秋,由一统转为多元,也是历史的重演。当然,所谓历史的重演,并非历史的重复,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,只是螺旋式上至某一阶段的相似而已。魏晋以老庄思想为主,但也很重刑名法术,即便儒家,也不是一味排斥,其所摒弃者,乃汉儒的章句之学和讖纬之学,至于儒学中的等级观念,却是魏晋人所重视和汲取的。本书援引蔡元培《中国伦理学史》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一点:“魏晋玄学家之思想,非截然舍儒而合于道佛也。彼灭裂而杂糅之。彼以道家之无为主义为本,而于佛家则仅取其厌世思想,于儒家则留其阶级思想,及有命论。有阶级思想,而佛道两家之人类平等观,儒佛两家之利他主义,皆以不相容而去之。有命论及无为主义,则儒家之积善,佛家之积德,又以为不相容而去之。于是其所馀之观念,自等也,厌世也,有命而无可为也,遂集合而为苟生之唯我论矣。”可见,魏晋之复活先秦诸子,并非照搬诸家思想,而是有所扬弃,有所发展。

其次,本书还注意到魏晋思想在流传中的选择性。生物进化中的自然选择,又称“天择”,说的就是适者生存。社会思

想的流播,适应于社会环境者就能传开,并产生影响。譬如文学观念的流行,正是适应了当时的学术环境。本书列叙曹丕、陆机、葛洪对于文学观念变革的作用,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启其端,始重视文学,“有离开六艺而注重纯文学的倾向”;陆机《文赋》则“完全离开儒家伦理观念的束缚,从纯文学的观点,发出许多可贵的议论。他这种思想,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,自然是很大的,于是大家都承认文学是一种独立的艺术,专门论文的著述,和文集编纂的著作,也就一天天多起来了”。陆机的理论是建设的,葛洪的理论则是破坏的,“他能以老子的自然论与庄子的进化论,应用到文学观念方面去,所以他的见解击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,而发出清新自由的理论了”,“他从时代的变迁,说到文学的进化,用言语不同,章句残缺,古事醇素,今事雕饰种种合理的见解,来说明今古文章不同的原因。这种观念,既合进化论的科学原理,其论点又非常正确,比起儒家那种盲目的拜古主义来,真不知要高明多少倍了”。“我们可以说,魏晋的文学,是完全建筑在当日的哲学思想与宗教思想的基础上的。这种哲学宗教思想的构成,又以当日的政治现象与民生状况为基础”(以上引文均见本书第六章)。意即文学观念之所以进化,正是以其能适应于当时的社会思潮。

其三,本书注意到魏晋思想在发展中的变异性。生物体经过杂交,可以分离出各种不同的子代个体,这就是所谓变异。社会思想的相互交流和影响,同样也会发生变异。譬如魏晋思想虽是多元化的,大体却以道家老庄思想为基调,所以其他思想在这一时期,大都受到道家的影响而变异,经学玄学化,佛学道家化,便是明证。作者指出:“建安以后,儒学的权威虽是倒了,但那些玄学家们并没有轻视孔子,对于经学也没

有完全放弃。他们努力把老庄的学说,灌到经学内去,把儒道二家的思想,加以沟通和调和。”儒家经典中的《周易》,到了王弼、韩康伯手中,完全老庄化了,也成了玄学的经典,而与老、庄并称“三玄”。郭象之解《论语》,以“万物自无为而治”、“以不治治之”来解释《论语》“修己以安百姓,尧舜其犹病诸”,“这完全曲解了儒家的意见,而强迫加以道家化了的”。这可以说是汉儒经学的变异。佛教东渐始于东汉明帝之前,其初来中国,“国人尚难解其真义,于是与当日流行的道教,彼此混杂,互相推演,当时信教者与传教者,都未能将佛道二教分辨清楚,多视为出自一门”,“到了魏晋,老庄的哲学独立发展起来,与道教徒假托的黄老分道而驰,一为民间信仰的宗教,一为魏晋时代学术界的正统了。在这种变化时期,佛学也脱离了道士的附庸,而与老庄的玄学相辅而行,大为清流之士所爱好。于是佛学的发展,又进于一个新的阶段了”。佛学从混同于道教,至与道家思想相辅而行,实经历了二度变异,其后名僧支道林以佛学之空观解释庄子逍遥的真义,又时或以老庄之学去解释佛理。“在超现实的那一点上,佛道二家思想的根底,是有些相同的。所以当日的名士沙门,都是讨论空无的真义而彼此契合,互相发明”,“沙门得与名士同游,哲理得与老庄互证了。彼此调和彼此推演的结果,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,都渐渐地染了佛学的色彩了”(以上引文见本书第二章)。佛学的再一次变异,几乎反客为主了。

如上所述,本书基本上以丹纳进化论之史观论述魏晋思想之进化,其所引证之社会环境,大都指意识形态,即所谓“精神气候”。就意识形态范围内各种思潮的演进变化而言,自是言之成理,但尚未尽透彻。这正是进化观的局限性。丹纳《艺

术哲学》傅雷译序云：“我们在今日看来，丹纳更大的缺点倒是在另一方面：他是竭力挖掘精神文化的构成因素，但所揭露的时代与环境，只限于思想感情、道德宗教、政治法律、风俗人情，总之是一切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。他没有接触到社会的基础；他考察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却忽略了或是不够强调最基本的一方面——经济生活。”当然，本书有时也力求克服进化史观的这种缺点，试图从经济生活、阶级关系方面去探讨，注意到“当时土地私有，货币贬值，物价昂贵，民不聊生，贵族富商，互相勾结，集中资本，剥削平民”（本书第一章），因而不断引发农民暴动；又说傅玄“在一千七百年前，便提出资本家的剥削农民，压迫无产阶级，将成为社会上最严重问题。于是他大声疾呼，叫为政者要从这方面下手，更非一般人所能见到。他认清了社会上一切的弊病，由于经济组织之不良所产生，正与现代马克司派的社会经济学者的理论，暗相吻合”（本书第四章）。但是，从经济基础着眼去考察其上层建筑，并非本书的基本方法和观点。这里从阶级关系的角度去评价傅玄的政治思想，也显得牵强，至于以之与马克思经济理论相比拟，更是失当。正如作者自己说的：“对于这种新思想是表示向往和追求，但这方面的知识是肤浅的。”（《关于〈中国文学发展史〉的批评》，《文学评论》1959年第二期）纵观全书，其理论框架，毕竟仍属于进化之史观。

四、借古以鉴今

司马迁认为“古今一体”，故“欲以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（《报任少卿书》）。贵古贱今，食古不化，自非